

【第五章】 儒家道德與世界經濟

第一節 韋伯之理論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韋伯(Max Weber 1964) 以基督教教義，特別是新教的加爾文主義(Calvinism)，闡釋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以上帝啟示的權威為基礎的清教徒工作倫理觀(如誠實、勤奮)，一直是支持西方世界人權、自由和平等觀念的來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共識才逐漸被實用主義所取代。¹⁰⁹ 按照韋伯的觀點，西方現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化」(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其中包括科技理性與經濟理性。他所說的理性概念有兩種：即「價值理性」又作「實質理性」，另一種是「工具理性」又作「形式理性」，所謂「形式理性」是指一組方法和程序的可計算性極高，反之，「價值理性」則是指方法和程序的可計算性極低。而他所說的「理性化」作為「現代化」過程的本質，並不包含「價值理性」，「理性化」實際主要是指「工具理性」。同時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用精密的技術和計算把一切都理性化，也把人變成了機器、金錢官僚制的奴隸，他把這種由追求效率而造成的金錢商品的崇拜機器對人的精神靈性的泯滅稱為「形式的合理性」和「實質的非理性」，「理性化導致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從而揭示了現代性的矛盾與異化。¹¹⁰

二、價值理性的儒家道德

韋伯認為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實質性的倫理，貫穿於其中的是「價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儒家的實質性倫理不僅影響了東亞人民的社會行為，而且也影響東亞人民在經濟企業時易於傾向於以家族成員為核心而形成家族企業，家族企業的特色在組織結構上是企業為家族所有，企業之規模偏小，組織結構簡單以及任用私人等，而在經營歷程上是採取權威式的領導風格，非參與式的決策方法，缺乏成文的規章制度。家族企業的缺點是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不分，企業主獨攬大權而造成獨裁式的領導，無具體客觀之控制標準來考核員工的績效，個人和組織間的交往大多依人情法則來進行，重視「價值理性」而輕視「工具理性」的家族企業其經營績效並不高，例如 Negandi 曾在我國做過一項調查研究，比較九家美資七家日資，以及十一家本地大型企業的組織與管理方式，發現本國企業由於授權程度低，人力運用低，對屬下的信任低，故員工的士氣不高。¹¹¹ 這樣的家族企業是還沒有徹底貫徹儒家道德，家長什麼事都一手包辦，小孩子自然就

¹⁰⁹ 李春旺，《企業倫理》(台北：中正出版，民國八十九年)，第二百二十二頁。

¹¹⁰ 黃俊傑，福田殖主編，《東亞文化的探索》，陳來，儒家思想與現代東亞世界 (台北：正中出版，民國八十五年)，第一百九十五頁。

¹¹¹ 黃光國，《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出版，民國七十七年)，第二百三十七頁。

習慣依賴，家長累得要命，小孩還是難以成長；實踐道德的企業主該完全信任與授權給部屬，尊重部屬，各適其性，各得其所，發揮各自的長處，才能互助共營，讓家族企業能如虎添翼。

三、儒家道德與資本主義

在韋伯看來，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是「所有理性之社會行動的基本形態」也是資本主義之經濟秩序的基礎，在這種交易的過程中，個人將神聖的禁忌、傳統的特權，或對兄弟尊長的義務一律排除，而只考慮自己所欲獲得的財貨，精打細算地設法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這種以客觀理性的精打細算來從事主觀上理性的市場交易行為，韋伯稱之為「工具理性的經濟行動」。儒家思想是否有助於或有礙於國家現代化，直至目前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韋伯認為儒家倫理思想有礙於中國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在其所著《中國之宗教：儒家與道家》（*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書中研究發現儒家強調對世界的理性適應，不想主宰世界，且只追求對既存世俗權力與秩序的合模行為，傳統中國在儒家倫理的影響下，不利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因此，認為儒家道德不能推動社會經濟秩序之變革，亦無法開展資本主義。¹¹²換言之，韋伯認為儒家思想是有礙於傳統中國的現代化。

第二節 亞洲經濟奇蹟

從二次大戰後到二十世紀末，國際上共出現過四次的產業轉移浪潮。第一次是1950年代，美國的援助與對日本的扶持，向日本轉移了部分的輕工業，啟動日本戰後二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第二次產業轉移，是1960年代，西歐、美國與日本，向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與巴西、墨西哥等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順勢發展了新興的工業化。第三次是1970年代，亞洲四小龍因為經濟的迅速發展，弱化了廉價勞動的優勢，所以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等地，造就了後來的亞洲四小虎。在1980年代後，美國與日本將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到亞洲四小龍與亞洲四小虎身上，同時，亞洲四小龍與亞洲四小虎，也將它們比較成熟的輕工業，轉移到中國大陸。¹¹³亞洲出現了經濟奇蹟，它的共同點就是社會文化在歷史上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亦稱華人文化圈，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要不是新加坡大部份人民受過儒家思想的薰陶，我們是無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¹¹⁴因為這

¹¹² 鄭伯璜，黃國隆，郭建志主編，《海峽兩岸之企業倫理與工作價值》(台北：遠流出版，民國八十七年)，第九十八頁。Weber, Max, 1864-1920. *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With an introd. by C. K. Yang.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4, c1951. London : Collier-Macmillan.

¹¹³ 《遠見雜誌》，劉從夢，以世界性眼光面向全球市場，2004年12月，第二百二十四頁。

¹¹⁴ 李春旺，《企業倫理》(台北：中正出版，民國八十九年)，第六頁。

樣的經濟成長的特殊經驗，不少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儒家倫理的積極功用，並且也覺得韋伯對於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許有修正的必要。

Kahn(1979)Hofheinz&Calder(1982)及 Berger(1983)等人卻都強調儒家倫理乃是近代東亞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文化動力。Berger 認為韋伯所說的儒家倫理乃是指中國帝制時代儒吏及士大夫的意識型態，而非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世俗化的儒家倫理，此包含了重視紀律、努力工作、節儉和諧團結等價值與規範，以及對家庭無條件無保留的奉獻。¹¹⁵ 而此一世俗化的儒家倫理才是真正促進東亞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雖然韋伯指出儒家思想有礙於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但從韋伯的《中國之宗教：儒家與道教》一書中可看出韋伯只是刻意挑選了中國社會的貨幣制度、宗族組織、城市與行會、國家組織和法律等層面來分析它們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影響，此外，韋伯雖然指出中國人在儒家倫理的影響下，培養了一種有礙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心態」，此心態韋伯稱為「中國精神」(Chinese ethos)，然而，韋伯論點受到批評之處乃是韋伯所描述的，只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社會，而不是儒家思想本身，由於韋伯並未對儒家思想作過有系統的分析，故不瞭解儒家思想的真義，也沒有看出儒家思想中充沛的生命力。¹¹⁶ 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典範的經濟經驗表明，亞洲現代化有著自己的特色，或者說是自己的現代性，例如重視群體和權威，重視教育，看重現世，等等，都源自傳統，所持有的傳統價值觀都能為自己走出未來，所以不須否定自己，也不用在西方工具理性價值之下去尋找自己無符合的條件。

第三節 儒家道德之經濟效益

一、創新學習永續經營

把一隻青蛙放在適度的水中，慢慢加熱，青蛙不會感到危機的存在，所以當青蛙慢慢被煮死的時候，感覺依然很舒服，從來也沒想要逃生，員工也一樣，久了看不出企業文化的弊端，所以要有危機意識，要不斷學習，不斷創新，才能生存才能競爭。停止學習就是停止成長，企業組織就會開始委縮。企業生命決定於企業經營者的觀念、心態、目標、方法與堅持。儒家的管理哲學是邁向現代化，

¹¹⁵ 鄭伯璦，黃國隆，郭建志主編，《海峽兩岸之企業倫理與工作價值》(台北：遠流出版，民國八十七年)，第九十九頁。Kahn, H.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 1979 and beyond*. London: Croom Helm. 1979. Hofheinz, R., J., & Calder, R.E. *The eastasia edge*. Basic Books. 1982. Berger, P.L. *Secularity: West and east*.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Kokugakuin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ium. 1983.

¹¹⁶ 蘇鎮安，《先秦儒家修己安人理念之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七年六月)，第一百三十七頁。 *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With an introd. by C. K. Yang.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4, c1951. London : Collier-Macmillan.

基於傳統而不斷創新，適應時代，如《大學》所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此才能使道德管理哲學在企業生命中持續發展。經營者如能本乎此種精神，運用智慧，注重研究發展，企業之創造發明必能永存於世。

二、互助共營代替競爭

假如每個員工都能做道德實踐，企業主就有時間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不用把時間浪費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因為每個人都能自愛、自動自發、互相幫助。

「競爭」在經濟學上的定義和心理學上的定義不同。在經濟學上「競爭」是跟一個廠商能影響價格的能力有關，所謂「完全競爭」，乃是無人在總市場中大到足以影響市場價格的情況。雖然如此，廠商不一定喜歡「完全競爭」。在心理學上「競爭」跟「實務」很密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彼此爭求以得到一稀少資源，如：晉升。這兩個人都意識到對方的競爭。當一人得到這稀少的資源時，他被看成是贏家，另一人被認為是輸家。為何要有競爭？經由競爭去分配稀少資源，可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¹¹⁷但是競爭必須要有規則可循，受道德約束，才是良性的競爭。孔子說：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篇）

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君子不與人爭，但假如遇到必須要競爭的事情，也都依「禮」尊照規範光明正大，這樣的競爭是君子之爭。有子說：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篇）

有子的意思是：禮的作用，和諧最為貴重。先前有道德的帝王的處事準則就以此為美，大小事情都會遵循它。有的事情雖然知道它也很和諧，但沒有這麼做，是因為這些事情如果沒有禮來約束的話，也是不可行的。

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在追求和諧，但這種和諧必須受到禮的約束。非禮、缺德、違法是不會產生和諧的，犯罪集團和黑社會雖然在內部看似非常注重禮節，但他們的禮節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利用或訛詐的基礎上，是社會進步和發展中極不和諧的因素。和諧會帶來雙贏，會消除惡性的競爭，現代的經濟社會是相互合作的時代。¹¹⁸企業應顧全社會整體之利益共存共榮，過當的競爭終將危害社會大眾。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倡導道德的國家，就

¹¹⁷ 李春旺，《企業倫理》（台北：中正出版，民國八十九年），第九十九至一百零二頁。

¹¹⁸ 公然，《當論語遇上企業》（台北：海鷗文化出版，民國九十三年五月），第三十一至三十三頁。

當代社會而言，企業的職業道德主要表現在共同發展，共同提高，共同進步的合作精神，反對一切不利於行業發展惟利是圖的種種不正當的競爭，當今世界顯得越來越小，國際間企業間的合作越來越緊迫，視競爭對手為朋友已成為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

三、打造企業良好形象

工作場所正逐漸被視為教化人性與社會價值的地方，基於這個現象，許多商業領袖也瞭解到擁有敏銳的商業能力與塑造良善公民形象是必要的。¹¹⁹ 企業商標(CIS)，廣告設計等等都是替企業廠商做行銷與形象，但是企業的形象不能全靠媒體，主要還是奠基於堅實的道德基礎，讓社會大眾信任。取得信任人才才會來，例如有辨識能力的求職者、有辨識能力的雇員、有辨識能力的投資者、有辨識能力的消費者等等，都會希望自己所服務的公司、合作的廠商、消費的產品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因此實行道德管理必能打造表裡如一的企業良好形象。

第四節 儒家道德對世界經濟之重要性

孔子儒家思想，放諸四海皆準，並不侷限於中國，孔子的觀點可以正名為世界性的觀點。儒家道德告訴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當自己自覺到自己是一道德主體，慢慢的會去發覺自己與身邊的每一個人彼此之間有一種連結，有情感有責任有愛，並不是孤單的個體；進而再擴及社會、國家，甚至是世界萬物，也是同一體的，「人」不是孤單的群種，對這個世界有情感也有責任，因為彼此是息息相關。企業的存在，對世界資源有強大的支配能力，更何況現代企業都走向國際化，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企業是否有道德地運作，都影響著人類未來的生活。

五千多萬非居住在中國大陸的海外華人，成為一股強大的經濟勢力，結合了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充沛的人力及遼闊的土地，大中華經濟圈迅速崛起，世界銀行已經指出：「跨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包括台灣、香港、大陸在內的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規模將超越日本，直追美國，甚至可能躍居世界第一。」¹²⁰ 台商、港商及其他華人企業的國際化所帶出的家族企業全球化。全球化的興起以及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在在擴大了企業家與企業人士的活動範圍。

自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9)以來，香港已產生三項促使政府當局和企業較願意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重大「轉變」，這些政治經濟和倫理的轉變交互作用，對亞洲未來的發展至關緊要，尤其關係到它們能否發揮強化彼此的力量，以協助

¹¹⁹ Peter W.F.Davies，歐陽敏，陳永芳譯，《企業倫理》(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民國九十年十一月)，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頁。

¹²⁰ 鄭伯壘，黃國隆，郭建志主編，《海峽兩岸之企業倫理與工作價值》(台北：遠流出版，民國八十七年)。主編的話：迎接華人管理世紀的來臨。

本區找到其他發展途徑，亞洲迫切需要嘗試替代方案，因為龐大的人口使得發展的影響既深且遠，而符合或違反環保條件的發展所帶來的利害，也將回頭衝擊本區的社會狀況。其轉變有三，一是政治，第二點是在經濟層面上提到浴火重生後的亞洲將是全球未來 10~20 年的經濟火車頭，亞洲的金融危機，比二千年歐美經歷的經濟危機更早發生，也更早進行體質改革，經濟逐漸好轉，整體而言，亞洲的經濟規模成長快速。亞洲的掘起似乎無法逆轉，美國中央情報局最近的報告預估，在二千零二十年以前，世界地緣政治的重心，將移往亞洲。亞洲經濟將是世界之領導。第三項轉變是企業道德，企業使用的語言已經發生變化，自西雅圖會議以來，企業領袖已開始談論必須促進「具同理心的全球化」和「人性的全球化」包括亞洲的跨國企業已簽訂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以如何善盡全球性企業的責任。¹²¹

¹²¹ 鄭伯壘，黃國隆，郭建志主編，《海峽兩岸之企業倫理與工作價值》(台北：遠流出版，民國八十七年)，第一百六十四頁。